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本报评论员 刘颖余

直言不讳。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对外培训乱象,同样深表担忧,“教育培训的本质是教育,大量‘烧钱’进行营销宣传的做法不可取,建议这些机构少做广告。”

校外培训乱象并非自今日始,但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疫情催生各类学习APP与线上学习平台大规模涌入市场,也给有关部门的监管和治理带来更大难度。在过去的一年,来自官方统计数据 displays,教育培训消费投诉明显增多,知名培训机构关门、消费者预付费打水漂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针对一些在线教育砸钱营销、野蛮生长的乱象,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认为,这“完全将教育引向了商业化,教学引向了套路化,学习引向了刷题化,评价引向了考试化,学生学业负担、家长经济负担成为压在就学子女家庭的‘两座大山’。”

如果说这些偏离教育本质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制造教育焦虑、贩卖教育焦虑,有失偏颇,但它们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情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长期以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等观点甚嚣尘上,家长、老师唯考试分数是瞻,学校大考连着小考,学生不是在培训班,就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身陷这样的教育生态,人们又怎能不焦虑?

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对于教育的焦虑,就是对于学生分数的焦虑。如果老师、学生及家长对于分数没有正确的态度,焦虑就是一种不易摆脱的常态。

那么,我们今天又如何看待分数?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的一番话冲上热搜,“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也赢不了未来大考。一个学校没有升学率就没有高考竞争力,但是我们的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恐怕也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在唐江澎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分数只是一种重要

的手段,但分数远不是教育的全部,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教育是一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好的教育一定和焦虑无关,相反,它应该能在无声处,给每个人以人文、精神的滋养,让人免于浮躁,让社会和谐美好。

解决教育焦虑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对于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必要的整顿和监管,“对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另一方面,还要均衡教育资源,强化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发挥中小学校在课外教育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减少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还需积极引导社会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看待青少年的成长成才。

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在国家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当下,每个老师、家长,每个从事教育、关心教育的人,都应强化一种认识,尤其要大声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现场·我在我思

罗筱晓

又是一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今年此时,与“半边天”相关的新闻都铺天盖地。今年,包括“女性的角色首先是自己”在内的多个女性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张桂梅,用拳头打破女性偏见的张伟丽,将大半生光阴献给敦煌的樊锦诗……这些与固有女性形象差异颇大的“她们”,因为在自己选择的岗位和角色上成绩突出,赢得了深深敬意。

其实,即使是平凡人,选择“做自己”时也会相当酷。从去年9月起,一位叫苏敏的57岁阿姨开始自驾游,如今靠着不多的经费她已经去了50多个城市。此前多年,她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乃至外婆的角色,为配合“演出”也少不了忍耐、克制。她从未想过、也没体验过“自己”是谁,直到这一次“离家出走”……

除了那些角色,我们还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妇女节这天,苏敏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和刚出发时稍显木讷的样子相比,她多了不少自信和从容。

而这句话,送给困在“硬汉”“阳刚”“顶梁柱”角色里的男性或许依然合适。在李佳琦创下涂口红吉尼斯纪录之前,有多少彪足劲坚持“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大概就有多少因为“男人就该不修边幅”而想护肤、美容却不敢的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几年,在妇女节这个时间节点,人们的关注焦点越来越多地从“女性”扩大到了“两性”,此时一些与此相关的辩论、脱口秀节目甚至会成为网上“骂战”的导火索,排队、表态、开撕,场面一度还会不太好。

有人担心这样的对立会加剧两性间的芥蒂,破坏此前形成的平衡。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相比对确实存在的矛盾视而不见,摆上台面并寻求解决之道,显然才是良方。

比如,十年八年前,“女司机”被默认为是种不言而喻的揶揄,如今人们说这个词时已然多了几分谨慎,毕竟稍不注意就会被扣上偏见的帽子。多年前第一次看到“男护士”的相关报道时,那些小伙子甚至不愿在镜头前露面,而在去年的抗疫中,一群男护士干脆把自己命名为“男丁格尔”。再比如,因为女性用户的青睐,网约车和代驾行业中,女司机成了相关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在护理任务繁重的ICU病房,既能独自给患者翻身、扛设备,又能梳头、洗脸、擦身“一条龙”服务的男护士让不少医院管理者大呼“用着顺手”。

有人说“男女分工不同,应各自发挥优势相互合作”。这话如果删去“男女”,似乎更恰当一些;人分工不同,应该各自发挥优势相互合作。其实,除生理结构差异外,男女天生并无过多不同。因此必然有热爱拼事业的女性和在家务中找到乐趣的男性,可由于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女主外或男主内至今仍是会引人围观的“新闻”。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两性话题被看见、被讨论本身,其实已经在叫醒那些在固定性别角色中“沉睡”的人。

因参加《演员的诞生》重新走红的刘敏涛曾说自己活到中年才叛逆。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言听计从看似委屈实则简单,叛逆则需要判断能力和勇气的双重加持。

张桂梅、张伟丽、樊锦诗,她们的“叛逆”同样如此,不是简单的任性、放肆,而要靠智慧、坚韧、努力等品质,实现心中所想所愿,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发挥出各自的社会价值。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按自己的意愿、靠自身的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做过的事、经过的地方变得更好,这应该就是“做自己”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期待“办不成事”窗口助力政务服务更上一层楼

张子瑜

据3月8日《北京日报》报道,在北京多个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的总咨询台、窗口等位置,出现了一些标示牌,上面赫然写着“办不成事”等字样,且前来咨询、办事的人不少。这是办事机构针对办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疑难杂症”所开辟的专门渠道。

“办不成事”窗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成立专班、限期解决等方式,为群众各类久拖不决或者综合窗口无法办理的业务提供兜底式服务。如何办、找谁办、办不了、办不好等问题,在这里都能得到有效解答,即便相关事项不属于“办不成”的事,窗口也会为群众积极解惑、告知相关办事途径等。

比如一位女士需要申请低保,但其外籍丈夫早已失联,她无法拿出办理低保需出具的相关离婚协议,由此受阻,但居委会、街道对其情况比较了解,在向上级部门汇报后,各部门负责人坐在一起开了个会,共同商议后决定为她特事特办。

虽然设立了“办不成事”窗口,但最终目的还是要把事办成、办好。相应地,这一窗口要办的事可能涉及相关业务立项、交办、承办等多个环节,具体催办、转办、督办等也会牵涉到多个部门。把原本“办不成”的事办成,有助后续业务、事情的办理,也有助于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

“办不成事”窗口,让人不由联想起此前一些地方成立的“马上就办”办公室。这类办事窗口、办公室的设立,其实都是公共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让服务更贴心,让百姓更舒心的表现。一方面,这些窗口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千方百计为找上门来的公众解疑释惑、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一些“疑难杂症”、难点堵点的攻克,找出症结所在,总结出一些共性的,可以为今后工作改进提供参考和帮助的经验。比如,之前办不成、现在办成了,究竟是工作流程有问题?工作人员消极应付?还是具体制度存在滞后性和盲区?只有彻底摸清问题,进行纠偏,才能更快更好地提升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才能探索出更可持续的、群众更满意的工作方式和模式。

我们期待着,“办不成事”窗口早日“门庭冷清”,因为那说明,百姓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而职能部门服务水平、治理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给“纸面服刑”“提钱出狱”通上“高压电”

吴玲

据新华社报道,3月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将以全面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坚决整治顽瘴痼疾,坚决查处“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长期以来,“以权赎身”“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等现象给司法公信造成严重影响,在群众中广受诟病,引起强烈不满。人民法院将坚决查处“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的表态,回应了人民期待,令人拍手叫好。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目的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发挥刑罚功能。但现实中,这些制度有时被个别人利用,成为滋生权钱交易的温床。现实中,一些涉及“减假暂”方面的司法腐败行为,大多与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密切相关。比如,在安徽滁州就曾上演看守所所长导演假自杀、服刑人员“救人”获减刑的戏码。

监狱管理机关和执行机关是减刑、假释案件的第一道关口。不少罪犯或者家属正是看到了其手中的权力,从而不惜代价,进行拉拢腐蚀,换取减刑、假释。于是,在“立功减刑”上动歪脑筋、造假成了一条捷径。除了“表演立功”的造假双簧,还有“写文章立功”、买“发明创造”立功,等等,有的甚至形成了产业链,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生意。

坚决查处“提钱出狱”“纸面服刑”彰显司法公平公正。防止“减假暂”造假,一方面,应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当把法律的皱褶抚平”自由裁量权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正义公平适用,以程序正义来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裁量。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更严密的立功、减刑审查认定等程序,强化监督制约,坚持阳光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同时要加大检察监督力度,对滥用减刑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真正给“减假暂”通上“高压电”,让触电者付出惨重代价。

樊树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说,一些会议上要求“发言要直奔主题”,充满双耳的却不外乎“站位高远、主题鲜明,鼓舞人心、振奋精神”。一级效仿一级,有的基层干部在汇报工作时,往往也开口“思想统领、意志为先”,闭口“理论武装、重任在肩”。这折射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毛泽东同志1942年就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作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看病还是写论文? 医生本不该如此纠结

毛建国

“前段时间我们到县医院调研,那里的医生很苦恼,做科研、发论文压力太大。我觉得,没有必要所有的医生都去做科研,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医生,应该集中精力把病看好。”据3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在全国两会上的一番话引起热烈讨论。有代表抛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医生该忙看病还是该忙论文?

与高校老师“忙教学还是忙科研”之间类似,要求所有医生都去搞科研显然不合适,也不现实,而应当让科研归科研、临床归临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的工作性质本身决定了大多数医生需要身处临床一线,科研也要结合临床进行。要求所有医生都搞科研,必然加重医生负担,同时可能催生学术造假、学术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到

患者的诊疗和治疗。

不能否认医生搞科研的必要性,但也不该把科研任务强加于所有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身上。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所讲,“这是个导向问题,不能让大家都奔着论文去、奔着指标去。”

当下,有必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才是好医生,是靠看病出来的,还是靠写论文出来的?是实践出好医生,还是纸上出好医生?

这些年来对于“唯论文”的反思并不少,有关方面也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些纠偏,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论文的背后是职称,论文热通常来说是职称驱动,是潜藏在职称背后的职业地位、收入待遇等的提升。长期以来,人才职称的评定必须要通过论文这道门槛,这也逐渐导致了“唯论文”的不良倾向。

再往深里说,“唯论文”背后是一些行业和单位存在的“唯职称”现象,即“纸上人才”

上的形式主义”。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一些领导之所以在会议上看似“口若悬河”,却不能让自己的思想植根于听会者心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可能是领导对这些工作缺乏真正的了解,只能通过一些虚话、套话来掩盖自己“知识上的恐慌”;认为只有开长会、讲长话,才能说明工作的重要性;避实就虚,风险小,不担责,等等。

讲话直扑主题、不穿戴戴帽,讲短话、实在话,不仅需要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魄力,更需要从政者的能力和智慧,而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加强知识的积累、实践的总结,还要有洞察力,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只

改话风就是改作风

称这样的讲话或文章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其效果“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

文风话风反映作风,改文风话风就是改进作风,就是强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然而现实中,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应付的套话、奉承的好话在一些地方很有“市场”。类似开口“思想统领、意志为先”,闭口“理论武装、重任在肩”,最后再“强调三点、补充几个方面”……估计不少人都印象深刻。开短会、讲短话,是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会议太多太长,讲空话套话、穿靴戴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工作成效,如果不下大决心去解决,任由其蔓延、扩面,很有可能成为“语言

有这样,领导才能在讲话中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不拖泥带水,顾左右而言他。

实话实讲,讲真知灼见;长话短说,说真情实感,以“真”示人,以“诚”感人,话语才能具有公信力和震撼力,才能让与会者明确具体方向和措施,不头雾水、懵懵懂懂、如坠云雾之中。

中央纪委办公厅曾将“在工作中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作秀造势”列为重点整治问题之一,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履职尽责,对不良话风大胆亮剑,让干部不敢、不想、不能讲空话套话大话。实际上,不管是哪个部门、地方的领导者,都应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一些接地气,让公众听得懂、有所悟的话,而不是“正确的废话”“冠冕堂皇的套话”。

进而言之,改文风、改会风、改话风,改得效果怎么样,希望有关部门多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给领导画像、打分,倒逼其说真话、办实事、敢担当、强作为。